

學文與戰大洲歐

著 冰 雁 沈



店 書 明 開

1928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版發行

歐洲大戰與文學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著作者：

沈雁冰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自序

這是四年前已經發表過的舊稿子。

那時小說月報要出戰爭文學專號，而又適值歐洲大戰十週年的時候，我這篇論文就是爲「紀念歐戰十週」而作，等於應時糕點，其無價值，自不待言。現在又過了四年，大戰離我們似乎更遠了；幾乎滅絕人類的可怖的大戰只成爲漸就模糊的舊夢，現在這老歐洲正在慶幸傷痍的平復，光榮的歐洲踏過了血泊回到原來的地方了，巴爾幹依舊是世界的火藥庫，地中海沿岸的外交風濤依舊那樣險惡；雖然地圖上小小的換了些色彩，但是如同沒有那次大戰一樣，老調子又在唱，歷史又複演了。

因而我自己再看這篇四年前的舊稿子，也起了不妨再來一回的感想；我並且居然有點相信這篇舊論文的再印也不是全無意義了。

非常抱歉的是這篇論文的内容實在貧乏；當時倉卒「應試」，既沒有充分的參考材料，也沒有充分的時間；因為要按時付排，連本來也想說一說的大戰後的文藝新運動也付之闕如了。現在理應完這舊心愿，可是興趣轉變，材料散失，貧病交迫，都一齊成為阻梗。而且想到關於文藝思潮的這一段變化，一定有學力比我更深的人在那里研究，一定不久會有很完善的著作貢獻給讀書界，便覺得我是大可以藏拙了。更新到從大戰的塵花裏爆出來的文藝上的新運動，有的是已經夭折，有的是已經落潮，更有的是尚未完全成熟，便覺得更難落筆了。因此決定讓這篇論文照老樣子再印。

可是無聊得很，我還想說幾句廢話：

如果讀者迫不及待的想看一看大戰後新文藝運動的輪廓，那麼，現在就我記得起的範圍內，有下列的零碎材料是可以一讀的——

關於早天的達達主義運動，小說月報第十三卷第六號的海外文壇消息第一二七條法國藝術的新運動是講到過的；但是最好是找到一九二二年冬季號的美國出版的

“Oct Lore” 其中有篇 “The Life and Deeds of Dada,” by William A. Drake 說得較詳細。

關於落潮的表現主義運動，從前小說月報上登過好幾篇；要看較有系統的，則有一本容易找到的英文書，“The Drama of Transition,” by Isaac Goldberg，其中關於德國一章是專論表現主義的。日本文也有專論表現主義的書，德文自然更多；可是我不懂這兩國文字。

最後說到尚未完全成熟的蘇俄新文學，所謂無產文藝；這個名詞在現今已頗時髦，雖然尙沒看見多少中文的專書。蘇俄文藝論戰一書想來是大家知道的，特洛斯基的革命與文學聽說也快要譯好出版，——這部書的前五章是分析革命前後的俄國文壇狀況的；此外只記得小說月報的海外文壇消息有些零碎材料；十四卷六號文壇消息第一七三條俄國革命的小說，一九一條蘇俄的三個小說家，二〇三條俄國的新寫實主義及其他。可是我得附帶聲明，上述的海外文壇消息的三條，我當時是從英文材料做的，所以

無產文藝的理論是沒有的。我想，在這方面的書，將來大概會很多罷，照現在這樣大家都
很熱心。

目 錄

一 發端

二 文學家對於戰爭的贊助……………一

三 文學家對於戰爭的反對……………三

四 不譚戰事的青年文藝家……………一四

五 戰爭文學一瞥——小說……………四一

六 戰爭文學一瞥——詩歌……………七〇

七 戰爭文學一瞥——戲曲……………九三

發端

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的前一個月，英國的大戲曲家高斯倭綏（John Galsworthy）發表了一篇驚人的劇本叫做暴民（The Mob）。這一篇劇本雖然不是直接和大戰有關係的，但是恰好替一個月後震撼全世界的歐洲大戰作了個再真切也沒有的預言；這位眼光若炬的戲曲家早已窺見近代民族間衝突的癥結，早已料到那潛伏於民衆心底的偏狹的愛國主義會做出怎樣瘋狂的可怖的事來。我們看了暴民裏的英雄司蒂芬摩耳——一個國會議員，因為忠於自己的理想，反對政府對一個較弱的國家宣戰，被羣衆所唾罵，被六親——甚至他的妻室，所遺棄，不禁想起一九一五年間的羅曼羅蘭來；當摩耳被暴民攪毆的時候，他對他們說：「諸位朋友呀，我是不怕你們的。你們這班東西：欺陵弱者，作踐婦女，壓制自由言論。今天這樣，明天那樣。你們是沒腦子的。你們是沒

有靈魂的。如果你們算不得下賤，世界上就沒有下賤的了。如果你們算不得卑怯，那末世界上就沒有卑怯的了。愛國麼——卻有兩種的愛國——一種是我們的兵士的，一種是我的。你們都不是……嚇！你們能夠打破我的頭，打破我的窗門，但是別想打破我的信仰……」我們看了這種戛然獨立，不爲衆劫的精神，禁不住要想起大戰爆發後各國思想家文學家的態度來。

二 文學家對於戰爭的贊助

在此次大戰的狂飆下，在發瘋的愛國主義的威脅下，有許多文學者驚惶失措，改變了常態。能夠獨立於愛國狂的羣衆中間而夷然不動，像暴民裏的司蒂芬摩耳的，簡直只有不多幾個。此次大戰真是人類靈魂的天平，真是人類智識者操守的試金石。立刻試出來是「假貨」，最丟臉的，莫如第二國際裏的好漢，各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人物。其次，不能不挨著德國的許多老牌文學家。戰事一開始，德國的許多老文學家就一致替威廉第二宣傳；他們運用雄健的筆，鼓勵德國人上馬殺敵；他們全然忘記了從前說過的和平與愛，全變成了嗜血的戰神。德國以外各交戰國的文學家自然也有許多是贊助此次帝國主義者的大屠殺的，他們並不比德國的老文學家好些，但是毫不慚悔地力說本國之戰是義戰，卻只有德國的一班老文學家。

老詩人檀曼爾 (R. Dehmel) 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冥想的詩人，「愛」的詩人；從他的「藝術救濟論」看來，他和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主義相去何啻萬里之遠。然而戰爭一爆發，這位「戰爭之仇敵」「一切人們的朋友」的老詩人居然作戰歌 (Schlachtenlieder) 作國族詠 (Fahnenlieder)，詛咒他從前認為朋友的敵人，讚美戰死沙場，為國殺敵了。他從前說他的智識是至少十個民族的「遺產」的綜合，現在他居然高呼只有德國的文化是救濟人類的文化了。他不但動筆，並且動手；以五十一歲之高齡，他竟披堅執銳，效命疆場，去抵禦俄羅斯兵。

我們又知道鼎鼎大名的霍普德曼 (G. Hauptmann) 他是昂屢赫 (Fritz von Urauh) 所謂「友愛的詩人」，他的織工描寫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勝利，他的沉鐘渴望理想的天國，他應該是反對資本主義戰爭的人了；然而自從戰事開始以來，霍普德曼就是一個熱心的威廉第二的黨徒，他並且糾合德國的智識者辯護德軍在比利時的暴行。惠特董 (Franz Wedekind) 也拋棄了他的新古典主義，來鼓吹愛國，自然主義的

老詩人何爾茲 (Arno Holz) 激怒到神經錯亂，狂呼「爲祖國戰死。」

老小說家托瑪司·曼 (Thomas Mann) 尤其荒謬。他積極的替德國的軍國主義辯護，他要證明德國的宣戰是合理的正義的。他說這次大戰是 Kultur 對 Civilization 的戰爭。(按此兩字都可譯爲文化，惟 Kultur 乃是德國的專利品。他說 Kultur 是人類精神的推進機；德國人民有傳佈 Kultur，改建歐洲的天職。他說 Kultur 和武力主義是兄弟——他們的理想是一樣的，他們的目的是一樣的，他們的原理是一樣的。他們有一個共同敵人，就是和平。托瑪司曼的擁護 Kultur 要比奧斯華 (Ostwald) 教授還要出力。奧斯華只說「爲求 Kultur 的勝利，武力是必要的。」托瑪司曼簡直說 Kultur 就是武力。

總而言之，自從戰事開始，德國的老文學家幾乎全體變做了威廉第二的忠臣；他們忘記了平日謳歌的人類，民衆，乃至藝術上的信仰；他們簡直看不出這次大戰是帝國主義者間不名譽的私戰，譚不到「愛祖國」，尤其譚不到什麼文化！

德國的老文學家在大戰時的態度既如上述了，然則法國的老作家的態度又如何呢？

法國自開戰時即自稱此戰是「自衛之戰」，是「復仇之戰」，所以法國文學家大都「義憤填膺」，對於戰爭一力贊助，對於德國一致攻擊。他們確已抓得了很好的題目去解釋他們的改變態度。但是實際上，他們終不免幫助了本國的帝國主義，他們也是一樣的看不見這次大戰是帝國主義者爭權奪利的私鬥，他們並不比德國的老作家爲可恕。

大戰既爆發後，法國處境甚窘，舊恨新仇又兼著祖國危在旦夕的心理，使法國文學家不論老年的青年的都贊助戰爭。（德國的老作家固多贊助戰爭，然青年作家大都持反對態度，詳見下節。）老戲曲家拉夫丹（Henri Lavedan）的呼聲自始就最動人聽聞。他在 *L'Illustration*（畫報）上每週的論文刺戟的力量，一時無兩；他本是偉大的諷刺家，所以他的論文於激發法國人愛國心而外，又忿忿的諷刺德人。這位有名的喜劇家，本

來是以「冷靜的銳利的觀察」成功他在劇壇上特殊的地位的，但是現在他失卻了他的「冷靜」；愛國復仇的呼聲已使他的腦子熱到沸點。並且他的銳利的眼光也轉了方向，只看見仇敵的德國人，卻完全看不到大戰的真正負責者原來不僅是德國人。

海洋小說的能手，以自然與愛爲遁逃所的陸蒂 (Pierre Loti) 也趕快從東方的快樂的異域情調裏逃出來，開始咒詛「野蠻的」德國人。

在伊壁鳩魯的花園裏曾說「嘲諷與憐憫是人生的兩大顧問；嘲諷時的微笑使人生可愛，而憐憫時的熱淚使人生神聖」的法朗士 (A. France) 曾經自己站在雲端而熱心冷眼來觀察世事的法朗士，現在也從雲端下來，混在這惡濁的人世裏，拋棄了「嘲諷」，也不取「憐憫」，卻來失態地高聲叱罵，並且也想到戰場上去效力。

象徵派詩人的領袖勒尼亥 (Henri de Régnier) 是古爾丹 (de Gourmand) 所謂「住在雲石和黃金的宮裏做他想像的夢」的，他的心境和外面的世界的情形是絕對相反的，(世界是那樣匆忙而雜亂，勒尼亥的心境卻是平靜而安泰)，現在他也唱起

戰歌來了活在信仰的光裏以主上帝爲唯一的引路人盼望在田野的寂靜中體念靈魂的平靖的介末司 (F. Jammes) 也未能免俗，祈求他的上帝站在法國的一邊，保佑法國的戰士奮勇殺敵，得到「正義的勝利。」

青年作家的領袖巴蘭 (Maurice Barres) 和瑣萊 (André Spézet) 也是出力贊助戰爭的。

巴蘭是法蘭西學會的會員，本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在二十六歲上發表了野蠻人所見等作品，以宣傳「自我崇拜」震驚了巴黎的文學界。可是不久他就走到了波特來耳 (Baudelaire) 的頹廢主義那條路上去了，他的血與死可爲代表。一九〇三年以後，他的浪漫的傾向漸漸減少，又到實際的路上。這樣一個巴蘭在大戰爆發時就成爲熱心的愛國黨。他在巴黎回聲報每日的評論，算是大戰開始後幾個星期中最激動人的文章。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二，他在倫敦演說，將此次大戰和中世紀的宗教戰爭比較；他說中世紀法國的武士爲擁護正教和日耳曼人惡戰，蒙了極大的犧牲，終得最後的勝利，現在法蘭

西戰士又來貢獻他們的第二次英雄精神，爲擁護歐洲文化和日耳曼人對抗，自古正義終得勝利，所以法國人這一次巨大的犧牲也是有代價的。我們只看這一段話，便知巴蘭眼中的大戰是一種什麼意義了。

瑣萊是同樣的熱心愛國，卻是另外一種說法。他本是文藝雜誌法蘭西新評論社內的健將，一個想像的神祕的詩人。他的作風是顧盼動情的，但又雄偉恣肆，是神祕想像的，但又尖利刺人。他用他這工具，替法國帝國主義者鼓吹愛國，不但激動了法國智識青年們的靈魂，並且震撼全法國人心。他在戰爭發生後所作的論文大都是讚揚法國民族性的。他的第一本論文集我們與他們用極肯定的清晰的方式證明德國民族和法國民族的心是怎樣根本的不同；他在第二本論文集這便是戰爭裏，用他那奇妙的文筆描寫這次戰爭是「生物學上的鬭爭」，仍舊是把德、法人種的大不同作爲立論的根據的。他說，在此光明與黑暗的鬭爭中，人是沒法守中立的。

巴蘭和瑣萊是青年文學家的領袖，他們對於這次大戰的見解並不比老年作家進